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遵义会议

郭军宁 编写
新华出版社



264.4
52

B820.115

K264.4

62

2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遵义会议

郭军宁 编写

目 录

一、王明是怎样上台的.....	1
二、根据地来了帮“洋房子先生”.....	6
三、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	14
四、从痛苦中觉醒.....	25
五、扭转乾坤的会议.....	32
六、遵义会议的光芒.....	39



B 734046

B820 115

K264.4
62
2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遵义会议

郭军宁 编写

目 录

一、王明是怎样上台的.....	1
二、根据地来了帮“洋房子先生”.....	6
三、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	14
四、从痛苦中觉醒.....	25
五、扭转乾坤的会议.....	32
六、遵义会议的光芒.....	39



B 734046

能如愿以偿。之后，米夫亲自安排王明担任中山大学党的支部局书记。在米夫的支持下，他拉帮结伙，组织宗派小集团，打击和陷害很多党的好干部。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瞿秋白，团员有邓中夏、王若飞、蔡和森、陆定一 etc. 同志。中共代表团并不同意王明宗派小集团在中国革命的一些策略问题上的意见，曾经同王明等人发生过争论。尽管王明等的观点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却得到了米夫的支持。于是瞿秋白同志就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的主要打击对象。

1929年2月，王明回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干事、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发表过许多带有“左”倾思想的文章。

王明在国内开始工作的时候，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29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在新的形势面前，共产国际陷入了盲目性。他们错误地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所谓“第三时期”，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因而提出各国党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工人阶级去解决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任务”，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转变的速度，都作了过“左”的估计。

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思想很快膨胀起来。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犯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王明抓住这个机会，打起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1930年7月，在

中央工作人员讨论“左”倾冒险主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时，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不是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李立三对王明等人的结伙起哄十分恼火，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和“小组织者”等帽子，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职务，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王明日后自我宣扬，以此夺取领导权的一个政治资本。

1930年8月，瞿秋白等同志回国。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李立三也承认了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理应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然而，并非如此。共产国际接连写来两封信，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立三路线”的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又批评党中央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严厉指责瞿秋白，说他犯了“调和错误”、“耍两面派”、“搞小团体活动”，完全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共产国际的来信，再一次造成中共党内的严重混乱，“左”的空气又一次抬头。王明等人原来是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并且接受了

党组织分配他们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的任务。但王明得知共产国际来信的内容后，一反常态，对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批评，指责中央犯了“对立三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混合物”等。同时，他又和博古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取消他们在“立三路线”时期所受的处分，企图逼迫中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还以此为借口，公开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赖在上海，精心炮制他们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纲领——被他们称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意见书中，他们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打扮成反“立三路线”的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硬说“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由此可见，他们举着拥护“国际路线”的金字招牌，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

11月底，共产国际的来信在党内宣布了。王明等人认为时机已到，便公开打出所谓“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这时，原来因反对“立三路线”而遭到打击的一些人也纷纷响应共产国际的来信，起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也卷了进去。结果掀起了一阵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风潮。

以上是王明上台的基本原因，更加直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又一次派米夫来华，一手包办了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一到中国就向王明交了底。王明用半个月时间，完全按照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左”倾“进攻路线”，加紧修改他们的那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与此同时，米夫将周恩来等人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弃之不用，自己起草了另一份决议，并且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参加人员到会。结果到会的37人中，有王明等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出席会议人数的40.5%。这些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米夫在会议报告中强调，李立三一贯反对列宁主义，要赶下台；瞿秋白旧错加新错不能再当领导了；何孟雄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能上台。谁能当领导呢？四中全会就是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王明根据《两条路线》小册子，摆出一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架势，大放厥词。他完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实际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策略的政治纲领，为新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① 1928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从1928年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结束、总危机尖锐化、“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

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在米夫的高压下，实现了共产国际把中共改造成一个完全“忠诚”它的支部的愿望。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会后不久，王明又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样，就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实权。

1931年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不久被蒋介石处死）。王明在上海郊区疗养院住了一阵以后，经米夫同意于1931年10月去了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参加了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工作。

二、根据地来了帮“洋房子先生”

王明上台的前后，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的时候。1930年4月，我党已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等10多个省建立了大小10多块根据地，红军发展为14个军，约10万人。为了加强对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作为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中央根据地正式成立。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代理。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由毛泽东代理书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使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工作方针。原来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只知道用俄国革命的模式来套中国，也就是坚持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城市中心论。他们不知道那种首先争取群众，然后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然而，出乎他们的预料，中国的许多块农村根据地和诸多支红军却独立自主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了。共产国际看到了这个事实，只好伸出手来抓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了。

六届四中全会虽然通过了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纲领，可是，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要想在中共党内实行这条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非易事。当时各个苏区在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方针和一整套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锻炼出一大批既会建军打仗，又懂得治国安民艺术的领导骨干。这批领导骨干是不会赞成脱离实际的“进攻路线”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只有直接派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抓权，实现其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控制，才有真正推行“进攻路线”的可能性。因此，“左”倾中央首先就在组织上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路线的斗争。这时，中央苏区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第三次“围剿”，使红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

扩大。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于9月20日通过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片面强调形势对革命发展有利的一面，认为“革命危机逐渐成熟”、“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富农路线，黄色倾向，反帝运动中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以至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等”。由此，在苏区、白区更加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中央苏区，“左”倾中央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1931年9月1日，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一些过“左”的指示精神（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倾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总前委写信，错误地批评毛泽东“阶级路线不明确和群众路线不充分”，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右倾政策，对地主、富农打击不力。根据这个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评毛泽东“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把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诬蔑为“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还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红军，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等。结果，排斥了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职务，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毛泽东的党内职务被撤销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召开了宁都会议以后，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内职务，让他专做政府工作。为什么在宁都会议上又一次打击了毛泽东呢？原因是这样的。

为贯彻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目前党内的任务是“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从而正式提出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特征的“积极的进攻路线”。对于这一冒险主义的计划，毛泽东根本不赞成，他认为“围剿”和反“围剿”将是中国红、白两军作战的规律，红军要想打破敌人的“围剿”，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根据地和红军。因此，他不仅反对出兵攻打大城市，而且建议打通中央苏区和赣南、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和巩固，为长期的反“围剿”战争造成一个巩固的后方。这一战略设想与“左”倾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有原则的不同，争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月10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准备在“首取赣州”之后，顺赣江而下，夺取吉安、樟树、南昌等大城市，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首先胜利。赣州战役前，毛泽东曾经提出反对打赣州的意见。他认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因为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大多数人坚决要打，赣州战役还是打响了。

赣州战役历时33天。红军虽经数次爆破，两次总攻，但由于赣州易守难攻和敌军增援，不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伤亡，赣州没打下来。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举行会议，讨论红军今后去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攻打赣州的错误，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应向赣东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方发展。但是苏区中央局又一次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后来，在行军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开会又决定，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向闽西发展。

从4月至7月，东路军在毛泽东率领下发展顺利，先后取得了漳州战役和水口战役的胜利。7月下旬，中央局代表周恩来到了前方，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建议设立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毛泽东担任。经过周恩来的坚持，取得了中央局的同意。8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8月间，在周、毛、朱、王共同领导下，红军又成功地进行了乐安、宜黄战役和南丰战役，连克三城，给敌人以很大震动。蒋介石急忙调遣10个师的兵力增援江西，并准备调集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不顾这一客观事实，指示红一方面军硬攻南城。周、毛、朱、王不同意这一指示，并在9月26日由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训令》，要求红军部队抓紧时间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布置战场，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

做好准备。这一《训令》对敌军的行动策略作了准确的分析，对我军的战备工作作了周详的部署，对以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料，这份《训令》又一次触怒了以项英、顾作霖、凯丰为代表的一伙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他们禀承临时中央的旨意，于1932年10月，从前线召回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在江西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

在宁都会会议上，项英等人说，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并且继续按照“积极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在敌人新的“围剿”开始之前，就以自己的进攻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造成“领导不能统一”等等。项英等人甚至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提出“毛泽东是否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逼迫毛泽东到后方去。毛泽东在会上也不示弱，尖锐地批评中央自进攻赣州以来，“过去7个月都错了”，“早应北上”，向赣东北发展，巩固和扩展根据地。结果，受到了更为严厉地打击。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10月26日，党的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党在白区的组织和群

众基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加上其它原因，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苏区中央局改称中共中央局。临时中央一到苏区，就组织了一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开展这场斗争的主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强行推行所谓的“积极进攻路线”。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之后，虽然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但无法消除毛泽东在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尽管他们污蔑毛泽东的主张是什么“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苏区广大干部群众偏偏认为还是毛泽东的一套办法灵。当时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同志在工作中就仍然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以及一系列正确指示，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做法。罗明甚至在给省委的报告中仍然认为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一个莫大的刺激。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就曾当面指责罗明：“你为什么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为了将他们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苏区更加迅速地贯彻下去，他们就拿罗明开刀，进而在整个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大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大整执行这一正确路线干部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从1933年2月15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闽赣

省委的决定》(闽赣省委实为福建省委)开始。首先指出省委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指出这条路线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并宣布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支部、区乡。在这一斗争中，临时中央完全采用对待敌人的一套，公开提出对“罗明路线”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不少同志误以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本人是反革命分子。罗明同志从前线回来，连炊事员也不给他做饭吃。

反对福建“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当时福建省的负责人谭震林、张鼎丞、郭滴人、刘晓、陈荣等都被扣上了“罗明路线的执行人”、“官僚主义者”、“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等帽子，并遭到了批判斗争，撤离了领导岗位。

福建的“罗明路线”还没有反击完，临时中央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重点批判邓小平（会昌、寻邬、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谢唯俊（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同志。不仅撤了他们四人的职，还把他們当作反革命关押起来，公开批斗体罚。在《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中，指责

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说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这一指责有对有错，邓小平等人的确执行了一条同“进攻路线”相反的路线，但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单纯防御路线”。他们四人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在土改、作战、建立根据地等方面的看法和做法，都和“左”倾中央不一致。他们甚至还公开表现出对临时中央的一些人从城市到农村来搞瞎指挥的不满，说“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实际是指王明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把临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称之为“洋房子先生”，说他们把“洋房子”搬到山沟里来了。这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它揭示了“左”倾冒险主义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实质。

三、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集中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敌人改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方法，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企图逐步压缩革命根据地，然后寻求红军主力作战，最后达到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已经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左”倾中央的这些人又不懂军事，只好求助于共产国

际。共产国际根据王明等人的要求派李德来到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可以认为，这是“左”倾中央直接派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抓权，推行其“积极的进攻路线”的第二个步骤。

李德，又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参加德国军队与沙皇俄国的军队作战，在战斗中被沙俄军队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最高任职为骑兵师参谋长。后来，他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学习期间，他学习成绩优异，还写了一些关于战争和战术问题的论文，再加上他有曾经参加过德军的经历，因而受到了苏联红军高级将领的重视。这次受命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他觉得这是大显身手、发挥自己才干的极好机会，因而欣然从命。他历经千辛万苦，于1933年10月到达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博古对于他的到来，非常高兴，并给他以极大的信赖，让他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的制定以及红军部队的训练、后勤组织等极重要的工作。这使李德实际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

作为一个献身国际主义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李德只身来到中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很大的辛劳，这点无可指责。但是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执行的是一条“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路线，再加上他过份自信，性格粗暴、专横，顽固地推行他那一套军事教条主义的东西，这就注定了他的军事生涯，必然遭到失败的噩（è，恶）运。